

人民日报记者、编辑与专家对话——

# 整条利益链 层层传导推高药价

常用药销售价比出厂价高2000%,甚至6500%,类似药价虚高的报道频频见诸媒体。有记者在调查中发现,出厂价与中标价之间的差额,成为医药代表向医院、医生推销药品的回扣的重要来源。本用以遏制药价虚高、减轻患者负担的药品招标制度,一时间被视为药价虚高的帮凶。果然如此吗?事实上,药企、流通企业、医院及整条利益链“潜规则”的层层传导,加上背后医疗体制、医药产业的积弊,共同推高了药价,不只是招标这一制度本身造成的。

新闻背景

## 利润到底高不高?

人民日报编辑:近期有媒体曝光,部分药品利润高达2000%甚至更高,引发人们关注。总体上看,药品利润真的有那么高吗?有没有具体的测算,生产厂家、流通领域等环节,各自利润大概有多少呢?

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李兰冰:这可能要分药的品种,有些药如某些进口药、常用药,可能达到这么高的利润。一般来说,药品的出厂价与销售价之间相差10倍是比较常见的。

人民日报记者:一般来看,生产企业的纯利非常小,尤其是常用药的生产企业,更多的利润产生在流通环节。大多数生产企业采用的是代理制,让中间的代理商层层加价,养活了上万家流通企业。由于缺乏严格的监管,这个流通过程存在挂靠经营、过票经营、买卖税票、过户经营等隐性交易行为。

人民日报编辑:针对流通环节的问题,目前有什么解决途径吗?

李兰冰:目前,药品生产、流通、使用各环节环环相扣,成为完整的利益链。要压缩流通环节利润,解决问题,不能仅仅哪痛治哪。我建议,建立药品全流程监管体制和行业信用体系,从生产、流通、使用等各个环节进行监管,健全法律法规体系,切断不合理利益链。

人民日报记者:“十二五”期间,药品流通领域将作为一项重点改革予以推进。在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的同时,将重新构建新的药品流通秩序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、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在第二届卫生论坛上指出,通过推进药品生产、流通、采购、定价、使用、监管等环节改革,建立健康的行业竞争机制,推进医药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整合,完善药品价格管理,重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。

## 招标到底好不好?

人民日报编辑:我国公立医院的药品是由政府部门向企业集中招标,医院采购,再卖给患者。这一项本意在降低药价虚高的措

施,现在却被视为药价虚高的重要推手。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?

李兰冰:集中招标制度设计本身具有一定优势,主要用意在于以批量团购的方式取得较低的价格,以市场机制保证药品质量。正因为有了这一制度的探索,才有了后来种种招标制度的改进。如2004年卫生部对8省区的医疗机构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试点、去年出台的基本药物新采购办法,都是在该制度的基础上改进的成果。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,在降低药价方面亟待发挥更好的作用,配套政策措施和监管制度亟待完善。

人民日报编辑:招标制度改革呼声已经很多年了,怎么改才能降低药价成本?

人民日报记者:北京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理学系主任史录文认为,招标制度的实施必须有配套改革,比如医院补偿方式改革、运行机制改革等。从各国的经验来看,降低了药价,不一定能让治疗费用降低。医务人员收入必须与药品收入脱钩,才能达到好的效果。据人民日报

## 对话

# 北大教授顾昕: 驳“招标推高药价”



顾昕  
北京  
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、新医改课题专家,研究方向主要有社会政策、医疗卫生政策等

现代快报:有人认为,药品集中招标反而推高了药价,真实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?

顾昕:药价主要不是招标这个环节给推高的。推高药价的根本原因,是政府对药品加成的管制,政府规定你卖药只能加价15%。假定政府规定饭店卖啤酒只能加价15%,那餐馆只能供应进口啤酒了。药价也是一个道理,最后就只挑贵的给你弄。关键在这里,和药品招标没什么关系。有这规定,结果把招标也给毁了。如果有专家说“招标推高药价”,那我要说他们脑残。应该说,药品集中招标在这个游戏规则下再怎么折腾也没戏。面对“只准加价15%”,即便医院这些人特好,恐怕也得用贵的药吧,因为不用贵的就没法活啊。在这种情况下,搞药品集中招标必备的一个环节,是由专家来评标,而专家一定是来自医院的,现在招标药海了去了,没有任何人能搞明白这些企业的生产成本等。如果说谁能搞明白,那简直是笑话,让官员去搞明白,也是荒谬的要求。而政

府官员也应该承认做不到这一点,问题是有些官员认为自己是什么都知道。如果他们说“我的理性和责任是有限的”,这事就好办了,那么有些事情就可以交给市场了。然而他们不承认,还抓着定价权不放。关键在这,不是没有把药价定准,而是企图把一个永远定不准的事情给定准。

现代快报:那到底该怎么评价药品集中招标制度?

顾昕:出台集中招标制度其实没什么必要,当然也不能解决问题,因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集中与不集中。

现代快报:老百姓希望能快速降低药价,那该采取何种做法?

顾昕:很简单,你就把各省的中标价通知所有的医院,这个中标价就是最后的价格了,医院可以自主采购和加价,但是不准突破“天花板”。医院肯定会挑便宜的,越便宜争得越多。当然它该不该挣那么多另当别论。现在,整个的环节被扭曲了。不是说这些相关的企业、医院多么坏,而是游戏规则有问题。新的集中药品招标制度实际上是死命打压药价的制度,那会出现问题。比如说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在山东出厂价是6角,中标价是7角,在另外两个省则是6角8分和6角7分,这不奇怪吗?而且我要问的是:哪个物流企业会用“8分钱”和“7分钱”运到这两个省的偏远山区?而山东当地的患者怎么就没吃上7角的药呢?  
快报记者 刘方志

## 今日视点

# 贫困线大幅提高更能体现公平和谐

11月29日,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,胡锦涛、温家宝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。中央决定,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,这一标准比现行1196元提高了92%,更多低收入人口将被纳入扶贫范围。(新华社11月29日)

贫困标准大幅提高,体现了中央对扶贫工作的重视。给予穷人兜底保障,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,扶贫济困不仅体现政府和社会的良心,而且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。扶贫工作千头万绪,其中扶贫标准决定着政府将向哪些人、多少人提供救助,在一定意义上,扶贫标准的高低意味着扶贫力度的大小。

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的扶贫

标准(贫困线)一直在提高,从1986年的206元到2000年的865元,从2007年的1067元到2009年的1196元。与此同时,我国的扶贫力度不断增强,特别是近年来,扶贫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。

不过,1196元的贫困线,仍低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日均消费低于1美元即属“绝对贫困”这一标准,一年1196元,相当于一个人月收入100元就已“脱贫”,而100元能做什么呢?平均每天3元多,光吃米饭够了,但吃菜呢?除了吃,还有穿、住、行、用,还有教育、医疗……无论如何,一年1196元是无法维持一个人正常生活的,这个贫困线确实太低。从另一个角度看,从上世

纪80年代中期至今,尽管扶贫标准增长了5倍多,但增速远低于同期GDP总量、财政收入、居民增收速度以及物价上涨速度。

此次中央将扶贫标准从1196元一下子提高至2300元,几乎翻了一倍,令人欣喜乃至喜出望外。2300元意味着,以目前的汇率计算,中国的贫困标准已经基本上与国际接轨,即达到了“日均1美元”;2300元也意味着,各级政府今后的扶贫资金支出将大大增加;2300元还意味着统计意义上“被脱贫”人口将大幅减少,更多贫困人群将享受政府救济。

扶贫标准的高低,表面上看是扶贫力度大小,根本上看关乎社会公平和谐。有些人认为,扶

贫标准提高导致贫困人口增多,会让不了解内情的人误以为中国贫困人口越扶越多,影响政府的形象。这种看法显然失之片面——不提高扶贫标准,实际的贫困人口依然贫困,靠较低的扶贫标准“减少”贫困人口数量无异于掩耳盗铃,贫困线太低与一个经济大国的形象不匹配;反之,提高贫困线导致统计意义上的贫困人口增多,则可以让更多的人群享受到政府的帮助,恰恰说明我们有正视现实问题的勇气和信心,彰显了政府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以人为本的情怀,也为正在努力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提供了有力的佐证。(晏扬)

## 公民发言

# 丙肝疫情背后 待完善的乡村医疗

近日,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丹城镇发生一起丙肝聚集性疫情,13人确定为丙肝病毒阳性。据初步调查,发现的丙肝阳性者均在某个个体诊所接受过静脉推注治疗,疫情可能是因不安全注射引起。

(11月29日《人民日报》)

农村小城镇的医疗条件,与大城市相比有着相当大的差距,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医疗设备上,也体现在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上。“老式的不锈钢注射器”、“针头经开水中消毒后继续使用”……你能想象此类事情,发生于大城市里的山大酒店吗?尴尬的现实是,即便在公共卫生领域,很多乡村也无可奈何地“被边缘”。其结果只有一个,在这些乡村,“更合理的医护规范”难被恪守,“更有效的救治手段”难以推广。

若照自发秩序演进,农村与城市、小城镇和大都会,医疗层次的差距注定越拉越大。发达地区具备完善的软硬件基础,之后,任何一次升级都只需支付更小的“边际成本”。但在相对封闭的农村,最起码的公共医疗地基,未能真正建成。对这些地方而言,即便是底线性的“规范化努力”,都会代价沉重、举步维艰。丹城镇的丙肝疫情,何尝不遵从着上述逻辑——当事医生痴迷“老式注射器”,当地监管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“丙肝事故”所反映出的“医疗水平时间差”,在根本上是社会结构中的一种不平衡表现。当一次性注射器,已成城市的常态物件,在乡村,“老式针筒”竟仍市场广阔,人和物,观念与器具……凡此种种,无不显得滞后一拍、落后一步。发生在丹城镇的不幸,绝不仅是失职医生的过错,亦不全是失职监管者的责任。一些乡村基础医疗条件,因为财力不足而无法改善,因为客观条件无法改善,而在主观上“一切凑合着办”,才是真正的问题和隐忧所在。(然玉)

## 热点纵论

# 让“天价内存条”的采购细节见见光

有人爆料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所购买的128M惠普打印机内存条,价格高达6274元。该所证实有此单采购,并称是通过正规渠道合法采购,价格透明,之所以会出现“天价”可能涉及特殊专业要求。惠普(中国)公司指定经销商透露,同型号的一般内存条只要300元左右,原装同型号的最高600元左右。

(11月2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“可能涉及特殊专业要求”,显然是苍白的托词,再特殊的专业要求,也几乎不可能波及打印机内存条,加之惠普(中国)公司指定经销商的权威报价,“天价内存条”已无可疑。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

究所作为财政拨款的科研院所,其经费来源大致有两个渠道,其一是财政拨款;其二是各类科研资金。当然,只要是政府部门支持的科研项目,其获取的资金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纳税人。只不过,财政拨款归中科院或者下辖各所管理,而科研资金归科研课题组使用。

鉴于此,对“天价内存条”清单需要区分对待。设若是财政拨款的支出,那么其性质与简阳市档案局、抚顺市财政局的天价采购没有区别,需要追查三方面的问题:一者,财政拨款数额是否经过科学论证和预算讨论,乃至于让一个研究所的资金富裕到如此奢侈的程度;二者,研究所

资金管理上是否存在漏斗式的问题;三者,从经销商最高报价600元左右,飙升至采购方6274元的高价,其中是否存在腐败问题。

如果“天价内存条”系由科研经费支出,那么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将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:有关部门对科研项目经费的预算审核、对经费支出的监督,乃至现行科技管理体制都需要重新评估。“不差钱”是不少中国科学家的体会,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全国政协委员陈运泰曾经说,如今中国科学家走到哪,都会见到外国同行羡慕的眼神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,我们在科技方面的投入,令外国人又羡慕又惊

讶。

当然,加大对科技投入无可厚非,只是好钢必须要用到刀刃上,而不能奢侈浪费。不久前,中科院原地球深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段振豪虚报冒领差旅费、涉嫌贪污一案,已经揭开了科研经费管理的脓包,让社会的目光聚焦到了“天女散花”般的科研经费上。

所以,需要扒清“天价内存条”的具体采购方和经费来源,以便对症下药亡羊补牢。当然,无论哪种形式的经费支出,都暴露出中科院在资金管理上的漏洞,需要严格的外部审计和调查,而非段振豪案中所谓的自查自纠。(燕农)